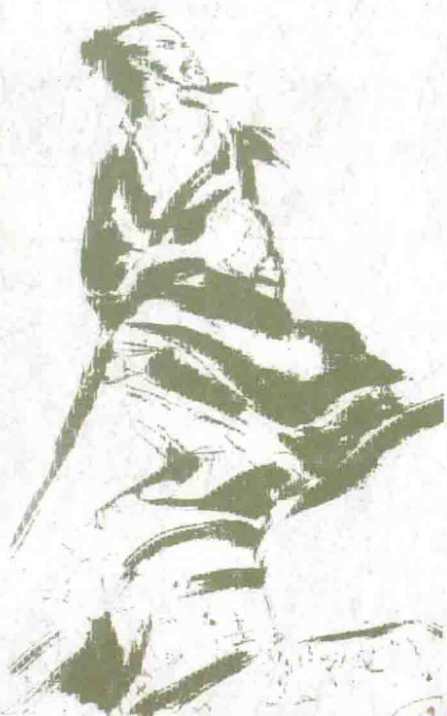


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
利添生物科技发展(秭归)有限公司

屈原文化



2007



宜昌市、秭归县领导与利添集团领导参加奠基仪式

弘揚屈原文化
發揚求索精神

羅子煒

2007.12.



宜昌市副市长廖达凤(右一)与利添总经理庞毅在奠基仪式为“雄师”点睛



宜昌市副市长廖达凤、秭归县委书记罗平煊，县长刘晓华及利添总经理庞毅、董事张为冰共同为利添集团秭归项目建设奠基

目 录

名家论坛

- 治学与学风·····汤炳正(1)
- 在2007年中国屈原学会年会上的致辞·····方 铭(18)
- 论屈原的“求索”精神及其在当代的文化意义·····孟修祥(21)
-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综述·····张 鹤(35)

“利添杯”大赛论文选

- 端午及端午文化·····袁子信(43)
- 归州“宋玉宅”寻踪·····袁子信(56)
- 宋玉·····梅大敏(60)
- 王茂元倾情屈原祠·····梅大敏(67)
- 试论《楚辞》中的山水文化·····陈国新(69)
- 《橘颂》与秭归脐橙的渊源·····陈国新(73)
- 弘扬屈原文化的作用·····宋发武(76)
- 《屈原研究》读后·····周志德(81)

屈原与秭归

- 屈原的故乡在哪里·····邓声斌(85)
- 屈原故里“秭归说”补述·····邓声斌(92)
- 屈原故里“秭归说”补正·····邓声斌(99)
- 附录:屈原故乡可能在汉寿·····毛炳汉(104)
- “武王之童督”铭文考辩·····邓声斌(109)
- 常德地方志有关屈原故里的记载·····邓声斌(112)
- 汉寿是古代春秋时的“濮地”吗? ·····邓声斌(115)

乐平里与屈原文化

屈原生地争讼的历史审视·····	谭家斌(119)
“乐平里”探考·····	谭家斌(129)
《招魂》探源·····	谭家斌(132)
屈原故里端午风·····	谭家斌(139)
“屈原传说”是秭归独特的文化遗产·····	谭家斌(142)
龙·龙舟·屈原·····	谭家斌(149)

散 文

一座孤傲的庙·····	周凌云(155)
屈原铜像·····	周凌云(158)
屈原金像·····	周凌云(160)
为屈原守灵的诗人·····	周凌云(163)
破茧而逝·····	秦晓梅(176)
早晨的时光属于楚辞·····	秦晓梅(179)
像童生一样读楚辞·····	秦晓梅(182)
在端午,想起汨罗江·····	秦晓梅(185)

诗 歌

吊灵均·····	王鲁复(179)
屈原·····	周 昱(179)
屈原·····	张 耒(179)
屈平庙·····	陆 游(180)
早发周平驿,过清烈祠下·····	范成大(180)
题屈原庙·····	王十朋(182)
过屈大夫清烈庙下·····	魏了翁(181)
吊屈原·····	侯克中(182)
屈原行吟图·····	黄 潜(182)
过香溪,舟人屈某为予言·····	龙鸣剑(183)
屈原庙赋·····	苏 轼(183)

汤炳正先生乃章太炎入室弟子，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。他的《楚辞》课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蜚声学林，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当年听讲之盛况。先生之学术著作，语言平白如话家常，简洁明快，思维严谨。本文选自《楚辞讲座》一书，略有删节。该书是汤先生 1983 年以前的讲义，由其贤孙汤序波先生在其身后整理出版，非常珍贵。本书选登的是第一讲《治学与学风》，略有删节。先生循循善诱，教导我们如何治学，如何开始楚辞的研究，对屈原文化研究者来说，这是最基础的一课，当有极大的裨益。

——编者按

治 学 与 学 风

汤炳正

我们知道，古今中外，凡是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，他们治学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，但是总括起来，是有共同性的。同学们将来书读多了，是能够发现这一点的。因此，我主要谈一谈这些共同性的东西，这对大家治学是有启发和帮助的。

第一，是端正学风的问题。

我的想法是，我们应该提倡实事求是、严谨刻苦的学风，跟解放思想、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，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、有所创造。

学术研究是带有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，又是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；所以，我们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，认认真真地读书（不要朝三暮四、心有旁骛）。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突破，往往要花极大的心血，少则三五年，多则十几年、几十年，有的甚至是一辈子，才可能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有所突破、有所创新（天道酬勤）。同学们可能知道，余嘉锡先生的《四库提要辩证》，用了几乎一辈子的工夫。他小时候读书，觉得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这部书对他有很大的帮助；但是他同时也发现，这部书存在着许多问题。于是他下决心，研究这部书。他花了几乎毕生的工夫，下了很大力气，写出了《四库提要辩证》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。这部书“文革”之前出版过（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），近几年又出了（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），同学们可以读一读。

这样的例子还很多，并不是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。德国大文学家歌德写《浮士德》，边写边改，花了六十年时间，直到他去世前才定下来。俄国大文学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名著《安娜·卡列琳娜》，修改了十二遍之多。可见，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学术著作，还是比较成功的文学作品，不下点踏踏实实的苦工夫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下苦工夫读书、下苦工夫钻研学问的精神（一个学者应不为利所惑、不为欲所动，耐得住寂寞、忍得住艰辛）。

在学习和钻研的过程中，渐渐地确立了一定的方向。当你的研究工作决定了方向，就应该全力以赴，用毕生的精力去学习和探索。在方向没有决定以前，应该慎重，不要轻率地决定；而在方向决定之后，就要坚持，不能够见异思迁，或者知难而退。问题不在于你绝对不更改，而在于应该慎重考虑。如果见异思迁，追求“浪头”，追求时髦，其结果必是一事无成。

那么，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如何决定呢？我是这样考虑的：应该首先看一看个人的兴趣所在，或者是性情所在，或者是基础专

长，在西方的科学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要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研究方向。这话很有道理。人才学也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“自我设计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所说的三个方面，即个人兴趣、性情、才能，以及基础都要考虑，不要偏于一个方面。现在学术界，有的人考虑钻研方向时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“热门”、“冷门”问题。大家都在搞，好，我也去凑个热闹；别人不搞，我搞了则独树一帜。这种现象是很不好的。我认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，不要过分想到什么“热门”、“冷门”问题。拿文学史来说，对于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，或者是对于文学史上带有关键性问题的现象，就是应该花大的气力去考虑、探索和研究，以期发现新的问题，得出新的结论，从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，对学术研究增添些新的东西。而不要过多地顾及什么“冷门”、“热门”问题。

前面我讲到兴趣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兴趣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的。你在没钻进去之前，对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。而当你真正钻进去之后，你就会感到兴趣无穷，乐趣无限，而别人则未必有你那样的心情。科研有时真像陆游诗歌所说的那样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当你感到钻不通的时候，真有点无路可走；而当你通过苦苦探索，获得了新的认识，有了新的结论，则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真是其乐无穷。而你对所进行的研究课题的兴趣，也就更大了。

关于刻苦钻研，大家是知道古今中外不少实例的。归结起来说，就是：天才是从勤奋之中形成的，灵机是从钻研之中出现的，机会只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。人们往往在某某人有了发现、有了成就时称之为“天才”，但不知道其人埋头科研，含辛茹苦，付出了多大的心血；人们往往爱说某某人的发现是“灵机一动”，但不知道其人刻苦钻研，所谓面壁十年，偶尔得之；人们往往埋

怨自己没有遇到那个“机会”，但不知道当你学术准备不够时，什么样的机会也不会来找你。

总之，做学问、搞科研是一个艰苦的过程，是一个勤奋的过程，休想不劳而获，或者侥幸取胜。我们都知道，太炎先生是晚清以来的国学大师，他天资聪慧，这一点大家都承认；但他发奋刻苦，则未必人所共知。我曾听章师母讲过，太炎先生在日本时，连下班的路上都在考虑学问上的问题。他下班回家，有好多次是钻进别人的宿舍去了。人家认为是客人来了，和他打招呼，他才恍然大悟。有人说太炎先生奔走革命，又有那么大的学问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“天才”。殊不知太炎先生连走路都在考虑学问，这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！我还听章师母讲过，太炎先生常常深夜突然披衣起床，拉开电灯，到书架上去翻书。原来他并没酣睡，还在考虑学问。有一回，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，大骂注《左传》的杜预。这些事都可以看出一个学者毕生是怎样地勤奋和刻苦的。读书学习、钻研学问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所谓“食不甘味，夜不能寐”，达到了忘我的地步。

所以我说：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。而另一方面，即使是一个天才，如果不勤奋，也会变成为庸才，最后一无所成。这样的例子很多。在我过去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。

我前面谈了“机会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”，这也是有不少例证的。发现辐射现象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，1903年（与居里夫妇一同）得了荣誉极高的诺贝尔物理奖。据说在贝克勒尔之前，有的实验员发现铀包在感光纸里感了光。实验员得到的结论是这两种东西不能放在一起。而贝克勒尔却进一步发现了铀的自发放射性元素，在科学研究中有了新的收获和突破（科学界以其名字“贝克”，作为辐射度量的活性单位）。这说明，机会是以踏踏实实做学问为前提的。为什么那位实验员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

题呢？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科学准备，所以对感光那样重要的现象也放过去了，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。

我个人在研究《楚辞》的过程中，也有不少机会。我们知道，《楚辞》研究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。先秦资料一共就那么一堆，摆在那里。有的问题别人没有发现，而我却发现了，并得出了新的结论。例如《江汉考古》1981年第1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，作者（郭德维先生）根据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，对闻一多同志所说的《天问》里的“顾菟在腹”中的“顾菟”是“癞蛤蟆”的看法提出了异议，认为“顾菟”就是兔子。而我则根据各种资料，证明了“顾菟”实质上是“老虎”。这个结论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的，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我原来提出的“神话往往以语言因素为媒介而逐步演化”的观点。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崭新的结论，是因为我成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，现在看到新出土文物的拓片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就碰上这个机会了。

以上主要谈的端正学风的第一个方向的问题，即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、严谨刻苦的学风。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解放思想、勇于探索和创新。

搞科学研究，无论是自然科学，还是社会科学，都要求去发现规律。例如我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，就要求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，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。但是，就每一学科本身来说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是十分艰难的；加之有时还有外来压力、讥笑，甚至于诽谤、迫害，工作起来就更难了。在过去时代，不少科学家在政治上受迫害，学术上也不被承认。外国的哥白尼就遭到了这样的厄命；还有达尔文，也是一样（此外，例如布鲁诺被烧死、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、马丁·路德·金被暗杀）。在我国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，都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迫害，最轻松的也要把你的论点

提出来在斗争会上批判一通；不懂也要装懂。要想从事科研工作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今天当然时代不同了，但是，学科本身的困难总还是存在的，外部世界的压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，因此，我们仍然要提倡勇于进取、勇于探索的精神。

当然，我们所说的勇于探索，是基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，而不是草率行事，追奇尚怪，更不是哗众取宠。

在探索的过程中，想像力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说文学创作需要想像力，人们都会承认；而我们说学术研究也需要想像力，有的人就不承认。作科学研究也需要想像力吗？是的，不仅仅是社会科学，自然科学也需要想像力。爱因斯坦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想像力比知识还重要。这句话正是从探索的角度提出来的。他还有一句话说：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“实在”的因素。我们要注意“实在”二字。爱因斯坦的话强调了想像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。而想像力又绝不是空虚的东西，不是毫无根据、毫无目的、毫无基础的瞎想，而是“实在”的东西，是建立在探索精神上的想像。可以这样说：没有想像力就没有探索力，就没有创新，就没有突破。

在科学研究各个领域，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中，都有不少权威。有的同志认为，既然有权威在那儿站着，这门学科我最好不要去动、不要去摸。这种看法是要不得的。我们应该懂得，再大的权威也不能终结该门学科，科学不会有顶点，也不应该有禁区。不能说某个权威使这门学科达到了顶点。就以《楚辞》研究为例，两千多年来出现了那么多的有名望的学者，那么多的高质量论著。就以当代《楚辞》学界而言，闻一多同志也好，郭沫若同志也好，游国恩同志也好，姜亮夫同志也好，成就都是相当大的。但是，是不是说《楚辞》研究就已经到顶了呢？闻一多同志等已经完满地解决了《楚辞》各个方面的问题了呢？显然不是。你

如果勇于探索，勇于创新，你也一定会取得成就，一定会超过他们，这是肯定的。因为学术总是向前发展的，关键在于勤奋钻研，勇于探索。1980年5月，胡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指出：“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重复过去的答案。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知识的前进，每个时代都要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。”胡乔木同志的这段话讲得很精彩，希望同学们好好领会。

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，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结论，有新的见解。美国学术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，就看他有没有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科学体系，这是唯一的标准。最近中国有不少学者到外国去参加学术会议。据他们回来介绍，会议在接受论文时，对那些只是归纳总结过去的结论，洋洋洒洒数万、数十万言的论文，一本也不要；但是如果你有创见、有突破，几百字的文章也被视为宝贝（重质量而轻数量）。拿我自己来说，我也想在《楚辞》研究中有所突破，但我感到，我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，下的是笨工夫，因此我也创不出大的奇迹。我在不少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，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再大的突破。我往往是看到了一些新的资料，触发了思维；或者是对旧资料提出一些新的解释。但我还没有真正做到勇于探索，胆子还不大。尽管如此，我在研究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：决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结论，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。努力探索，争取为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

以上我所谈的，是端正学风的问题。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，即学习与思考的问题。

关于学习与思考，我国古代早有人提出了。孔子就说过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这就是说，光学习而不进行思考，就惘惘然而无所得；光苦思冥想而不学习，就颇有些危险。看来

孔子的这两句话很有点辩证法。孔子还说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在孔子看来，学与思的关系不是平列的，而是有轻有重的，孔子是把学习摆在第一位的。我觉得，学与思的关系是这样的，即要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发挥巨大的思考力，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。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新发表的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书信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对我很有启发。王国维先生在信中写道：名家读书的时候，眼光力透纸背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凡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，读书时决不是浮光掠影，走马观花，而是独具只眼，能思考问题、发现问题。我们常说读书时要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；而名家却可以力透纸背，更深入一层。我们如果把王国维先生的话再引申一下，似乎可以说：如果我们读竹册木简，则应该“入木三分”。总之，一句话，要刻苦读书，更要善于读书，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积极思考，发挥巨大的思考力。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读书的，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资料，就可以得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崭新的结论。

关于学与思的关系，我强调要善于学习，善于思考，在学习的基础上更善于思考。学习一般人理解为是被动的，而思考则主动一些。善于思考才有收获、有创见。我们应该养成善思考的好习惯。

清代著名学者戴震，是朴学大师。他十岁时才能说话。这说明他小的时候并不是“神童”。但他发奋读书，又善于思考，学问长进得很快，终于成为清代很有名的学者。他读私塾时，私塾先生讲《大学》，讲到朱熹调整了《大学》原书的许多章节，又加了许多注解、说明，使之成为一个体系。例如《大学》“大学之道”至“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”一段，朱熹注曰：“右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”朱熹这样讲，没有任何根据。而私塾先生当然是依照朱熹的说法去教

戴震。戴震问他的老师：孔子、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？老师回答说：是春秋时代的人。戴震又问：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？老师回答说：是南宋时的人。戴震说：孔子、曾子与朱熹相隔将近两千年，朱熹凭什么说曾子述孔子之言，门人又记曾子之意？他的根据是什么？戴震的提问，他的老师回答不出，就是朱熹本人还在，他也回答不出。因为朱熹是无根据地推测、想像。虽然当时朱熹的说法是“钦定”的，但戴震却敢于提出疑问，敢于反对朱熹的意见。他从小就有思考问题的习惯，这很了不起。他后来成为一代朴学大师，与他从小善于学习、更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。他对于学问，不仅仅是知其然，更重要的是要知其所以然。如果不善于思考，则把朱熹的话背下来就行了。但戴震不是这样。这个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。在清代学术派别中，戴震是“皖派”，注重考实、创见，这跟苏州惠栋“吴派”不同。

我常常给同学们讲，读书学习的时候，脑子里要多有些“句号”“逗号”和“问号”，尤其是“问号”。读书学习是打基础，要一丝不苟。而我们谈到思考的话，则脑子里更应该多打几个“问号”。读书不能马马虎虎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“问号”多了，将来可以成为你科研的题目。有些“问号”，你一边读书一边就可以解决；有些“问号”，多年都解决不了，比较难，但只要这些“问号”装在你脑子里，你书读多了，还是能解决一些的；当然有的“问号”，你这辈子可能都解决不了，学术界其他的人也解决不了，那就留给后人去解决嘛。这有点像“歌德巴赫猜想”，到现在虽然只证明到“1+2”，但总是一步一步地接近解决。总之，我们读书学习时，脑子里总要打些“问号”。不善于打“问号”的人，不善于找课目的人，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的。

我孙儿小波，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時候，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他写的题目是《我的爷爷》，文章里说：“爷爷是个活字典。”我看

了以后叫他把这句话删掉了。我说：我不是活字典，我认不得的字、解不到的词还多得很，怎么是活字典呢？而且，我也决不愿意当活字典。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多少字、多少词。死记硬背的“记问之学”是不足取的。因为我更看重的是思考。

下面谈第三个问题，即博览与专攻的问题。

所谓“博览”，是指读很多的书；所谓“专攻”，则是指在学术上潜心钻研的方向。这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“博”与“约”的问题。古人云“由博返约”，是说首先要大量读书，然后回到专攻的研究课题上来。我觉得，单单提“由博返约”是不够全面的。我的提法是：在“博”的基础上走向“约”，又在“约”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“博”的范围。同学们正在打基础。但是，能否说经、史、子、集全部读完了才叫“博”呢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中国古书浩如烟海，你一辈子也读不完。同学们正在努力地读书，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将来专攻的课题，所以，“博”决不是泛滥无归，而是为了专攻服务的。所以希望大家既不要放松专攻方向，又要不断地扩大博览的范围。这种读书方法，才是可取的。

清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章学诚，写了一本《文史通义》，很有名。其中专门有一篇《博约》，论述“博”与“约”的关系。他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，故在该书的《假年》篇亦复论之，其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宇宙名物，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，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。”意思是说：宇宙间万事万物，与自己研究有关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漏掉，而与自己研究无关的东西，可以根本不顾及。这话有些道理，但讲得太绝对了点。因为有些东西，表面上看与自己研究的对象无关，但是如果你深入钻研，细细思考，你也许会发现，这些材料会大有用处；或者这些材料现在暂时没有用，但今后对你的研究会大有用场。我们说章学诚氏的话有点绝对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不过，他另有两句话，说得却很好：“博而不杂，约而不漏。”

(《博约》下)这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的。

就拿《楚辞》研究来说,语言学、文字学、训诂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神话学、历史学等方面的书,都应该读,要力求广博一些(古人有“不通群经,即不能精一经”说)。但是不能杂乱无章,漫无目的。因为你的研究有你自己的角度;对上述学科的学习,也不可能平均用力,一定要有重点。《楚辞》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。有个叫萧兵的年轻人,发表了不少文章,有不少创见。他主要是从民俗学、民族学、神话学的角度去研究《楚辞》,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。虽然有些文章还有些粗糙,但创新的东西也很不少。萧兵同志研究《楚辞》的方法,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。

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,也很注意角度。日本学术界研究唐代文学,有人从宗教的角度着手,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。唐代道教盛行,佛教也很盛行。文人学士多受其影响。你研究唐代文学,不注意这一重要事实能行吗?

而且,研究社会科学的人,还应该懂得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。我在这方面有切身的体会。如果我能更多地懂得一些天文学方面的知识,有一定的研究的话,我的那篇《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索》将会写得更好一些。

现在,在国际学术潮流中,大量出现了所谓的“边缘学科”。前不久,我听一位从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的同志说,美国有一门叫“医学工程学”的新学科,将医学与工程学结合起来,提出了医学研究中的一些新问题。在国外,学科是没有分得那样细的,跨学科、跨系别,这一势头还在发展,形成了不少交叉学科,边缘学科。据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,基础还是不错的,但是在交叉学科方面的知识就差一些。这与我国教育体制、教学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,而我们当研究生的,则应该自觉地